

兩岸文學論集(一)

文學星圖

施淑：著

兩岸文學論集(一)

文學星圖

施淑：著

820.7
846/5
2012
v.1
C551337

清華大學圖書館



C551337

書齋、城市與鄉村——日據時代的左翼文學運動及小說中的左翼份子

感覺世界——一九三〇年代臺灣另類小說

首與體——日據時代臺灣小說中類廢意識的起源

想像鄉土·想像族群——日據時代臺灣鄉土觀念問題

第三世界與島嶼臺灣——《聯合報》小說徵文獎述評

最後的牛車——論呂赫若的小說

臺灣的憂鬱——論陳映真早期小說及其藝術

憂鬱的寓言者——論知青小說《沉雪》的政治倒錯

更多章節詳見內文……



ISBN 978-986-6777-51-6 00320

9 789866 777516

人間出版社

NT320

兩個爭方的美式英語，就已意味著它被標榜為「政治正確」時，這些話即響答德國左派電影工作者對美國文化種族意識的排斥與恐懼。此外，立基在一九七九年發表的〈知識份子與獨立電影〉中說「戰爭變為毀滅，美國人侵佔了德國歷史，德國電影工作者不進行的有意義的自衛行動是，拍出了大量來自我們自己的歷史的影片，不加思索就表示對美國帝國主義的讚揚——這正是電影《家園》的主要藝術目的之一，而這清楚地寫在這部電影的標題與宣傳語上。」¹¹

上述觀念包含耐人尋思的一面：以文化領域中的地域性抵抗，來攻擊對萊茵電影所代表的文化帝國主義的壓迫和支配。由這一點來看，立基在《家園》中採用演員呂克方言，並把口傳的地方歷史文獻到電影中的技巧，看來就像是以文化上的游擊戰術，來反抗他們從自己的傳統表現方式所推出來的這樣的一個事實。

另一方面，這反美情緒還反映了德國左派的新策略。也就是說，當《家園》使德國左派與自己的國家右派——起碼在地域性的層次，「美國」似乎取代了「德國」一詞在左派知識份子心中的原有地位。就像多數德國左派，立基對美國的各式各樣矛盾，一向興趣缺缺，他只樂於描繪一個神秘的「美國」，一個永遠沒有根的國家，一塊孤單的、戰爭激烈的土地。這種形使人談不住要描繪「當德國左派試著調整他們對本土的原有態度時，美國會不會成為他們心理上的意外的防衛機制的一個新目標？」¹²

以上無疑是針對新老德國左派知識份子的心靈創傷的診斷，然而這病歷，連同它的診斷者，是否正迴響著一九八一年有布哈特（Hemar Kipphardt）那首描述著德國左派一切情懷的小冊中說的：

「這是一首關於德國左派的小冊子。」

「這是一首關於德國左派的小冊子。」

「這是一首關於德國左派的小冊子。」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文學星圖：兩岸文學論集. 一 / 施淑著. --
初版. -- 臺北市：人間，2012. 05
面；公分
ISBN 978-986-6777-51-6（平裝）

1. 臺灣文學 2. 現代文學 3. 文學評論 4.
文集

863.07

101008168

兩岸文學論集 1

文學星圖

出版者 / 人間出版社
作者 / 施淑
發行人 / 呂正惠
社長 / 林怡君
地址 / 台北市長泰街五九巷七號
電話 / 02-23370566
郵撥帳號 / 11746473 人間出版社
排版 / 龍虎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 / 龍虎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證 / 局版台業字第三六八五號
初版一刷 / 2012年7月
定價 / 320元

最後的牛車

——論呂赫若的小說

收集在遠景出版社出版的《光復前臺灣文學全集》第五冊《牛車》裡的呂赫若作品，雖然只有七篇，但卻是個豐富的文學現象。對於沒有能力直接掌握光復前以日文寫作的臺灣作家作品的讀者，這七篇翻成中文的小說，就像一九四七年呂赫若以三十三歲的英年，謎樣地被毒蛇咬死的慘劇一樣，相信不免會有驚詫、缺憾、痛惜和疑惑的感覺，因而自然地引發了對現代臺灣文學史及臺灣人民精神發展的追問和沉思。

根據目前的研究資料，呂赫若這七篇作品大概包括了他小說創作的主要部分，以光復前臺灣文學的發展情形來看，這些發表於一九三五到一九四四年的小說，正屬於成熟階段的優秀作品，因此就作者和時代而言，它們都具有不能忽視的代表性意義。從作品的一般表現，可以看出呂赫若的小說世界是跨越在日暮途窮的農業社會和勢在必行的工商經濟型態之間的，是故每篇小說都像剪影一樣，分別呈現變化中的個人和社會問題。如〈牛車〉寫依靠祖傳的牛車搬運貨物維生的工人，被運貨汽車斬斷生路的經過；〈財子壽〉和〈合家平安〉處理地主之家的內部傾軋和沒落；〈風水〉一篇透過渡海來臺的漢人對風水的迷信，探討農業道德的危機和解體；〈廟庭〉、〈月夜〉這兩篇連作及中篇〈清秋〉，以受過日本教育的年青一代為主，表現二次大戰末期浮動不安的臺灣社會及其精神現象。

在處理上述面目紛繁的題材時，呂赫若在態度上並未曾由任何旗幟鮮明的立場出發，也未曾按照什麼預設的意念對問題進行剖解，而僅只是以小說人物的遭遇和行為反應為基礎，像編年史一樣平穩客觀地敘述那發生在日本殖民統治末期的臺灣鄉鎮的生活現實。這種幾乎不帶任何激情也很少著意經營語言、結構的寫作方法，對於習慣於探求節奏和象徵意義等等的讀者，可能會覺得平淡無奇，甚至於是文字上的浪費。但這種基本上建立在敘述的（Narrative）而非描繪的（Descriptive）表現手法，卻使他的小說藝術呈現了現實主義的自然率真的風格，使他的小說在質地上具有總是不會缺少這樣或那樣的苦難和歡樂的人間的豐富性和親切性。這種藝術感性，這表面上看來近似於自然主義的瑣細的表現手法，與其說是受當時日本新文學思潮的影響，是出自作者有意識的設計，不如說是仍舊以農業生產為主導的光復前臺灣社會的迂緩的、沒有組織的性質，在意識上的反映，也即是忠實於寫作對象的作者，不自覺地掌握了的那時代的生活節奏。這情形特別清楚地表現在〈牛車〉、〈財子壽〉、〈合家平安〉、〈風水〉這幾篇處理一般社會和家庭問題的小說，就是以新人物的感情思想為主體的〈廟庭〉、〈月夜〉、〈清秋〉，那特徵也依然存在。在所有這些作品裡，我們感覺到的是春去秋來，歲月如流，一切似乎自然而然地發生、變化，一切事物都按照它內在的發展邏輯和一貫性被敘述出來，而不是被邏輯地組織出來，像靜物寫生似地加以細細描繪，使它們像一個個被製造出來的「成品」一樣出現。這種藝術表現，雖然使呂赫若的作品難免有叢雜的、失去中心的現象，但卻避免了早期臺灣小說常有的因社會改革的使命感而產生的急躁的、抽象的長篇說教，或為突出某一人物及事件的意義而著力描寫後所形成的結構上的局部擁腫。就藝術形式這方面來說，呂赫若的小說自有文學史上的深刻意義。

伴隨著緩緩的敘述，人世的變遷在呂赫若的小說世界一一展

現，它經常是間接的、曲折的反映在人物的行為意識之中，其中唯一的例外是〈牛車〉。在這篇發表於一九三五年的小說裡，社會變革以惱人的、既成事實的姿態闖入主角楊添丁的生活，使這位無知的牛車夫痛苦地感覺到「自己一天一天地被推下了貧窮的坑裡」，而整個事實是：

慢吞吞地打著黃牛的屁股，拖著由父親留下來的牛車，在危險的狹小的保甲道上走著的時代，那時候口袋裡總不缺錢的。就是閒散地坐在家裡，四五天前就會有人爭著來預定他的牛車去運米和山芋。當保甲道變成了六間寬的道路，交通便利了的時候，卻弄成這個樣子，自己出去找都找不著，完全不行了。後來弄到了連老婆都不得不把小孩子丟在家裡，到甘蔗田地或波蘿罐頭工廠去，否則明天的飯就沒有著落。

同樣惱人的事實是，本來理所當然地走在道路中間的牛車，現在被限制只能靠邊走，把道路中間讓給腳踏車、汽車疾馳而過。面對這些變化，楊添丁是完全無法理解的，他只能像其他農人一樣心焦地感覺到屬於「清朝時代」的牛車，即將被「日本時代」的汽車取代，只能朦朧地意識到「日本東西實在是可怕」，但是，為了生活，他不得不「比從前認真一百倍」的找工作機會，「不得不頑強地和某種視而不見的壓迫搏戰下去」。然而這由於生產工具的變革而來的生活困境，畢竟不是能以他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那同樣由於生產工具的變革而形成的新的社會關係也不是他改變得了的，因此儘管楊添丁把找不到工作歸罪於「街上的商人是寡情的」，他也只能懷恨在心，忍氣吞聲地到「不肯僱的地方去勉強求情」。到最後，眼看除了賣不出去的勞力之外已經一無所有的楊添丁，只有屈辱的要求他的妻子出賣她同樣已經別無所

有的身體，而雙雙走上他們永遠無法知道原因的毀滅的終局。

上面的故事是光復前臺灣文學常見的題材，呂赫若在處理時也與多數同時期的作家一樣，避免不了日本殖民統治的慘痛經驗，如小說中陰魂不散的警察「大人」，「政府」完全不管的污穢的「臺灣人街」。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小說人物的意識中，他們對於日本統治者的措施——如繳稅、不准牛車在道路中央走，及對殖民統治代理人的警察的憎恨——與其說是基於被統治的事實，不如說是把它們和機器混同起來，把它們看做那「視而不見的壓迫」的「日本東西」的整體。也就是說，在他們的心裡，日本統治者是以機器及它所代表的可怕力量的製造者、保護者的身份出現的，因而他們實際憎恨的目標，除了「大人」的有形的人身壓迫，寧可說是他們作為機器的護法者的身份，這也即小說所說的「混蛋機器，是我們的強敵」的強烈情緒。這意識上的變化是有深刻的社會和人性的意義的，一方面它反映了一九三〇年代日本殖民統治者繼糖業保護政策、米穀管理法案等措施後，進一步與大財團勾結，打擊農村經濟，對農民生活造成的威脅和夢魘。另一方面，它反映了在這農村經濟瓦解的過程中，破產的農人以他們那連同物質生活一道破產了的心理憎恨新財富的擁有者，從而敵對那創造新財富的機器文明。這中間的悲劇是：當牛車是通過鄉間小路的壟斷性工具時，作為它的所有者的楊添丁們是他們自己和他們的世界的主人；一旦汽車把牛車擠到新的工商產業大道的邊緣時，他們只能連同那失去了生產競爭的優越性的牛車，失去了他們優越的社會地位，只能被他們心目中「寡情的」、只求運用機器有效地累積物質財富的商人，視為沒有使用價值的、應該靠邊站的存在。小說中駕著牛車的農人，在夜間把那為商人立法的「道路中央四周不准牛車通過」的路碑，合力摔到田裡，讓牛車「主人似地不客氣地在道路中心碾著走過去」，而後勝利地高叫：「這時候是我們的世界！」這隊行走在黑暗世

界的夜行牛車，正反映了依靠直接勞動的小農經濟，在社會劇變中的直接的、笨拙的、痛楚的反抗姿勢，以及他們在現代世界史上的命運。

從一九三六到一九四一年，我們讀不到呂赫若這段時間的小說中譯，越過個階段，從一九四二到一九四四年，呂赫若的小說世界似乎換了人間，這時他的小說不再出現〈牛車〉中的社會場景，而只是些發生在家庭裡的變故，他的關注點也由社會層面轉移到人性問題。如〈財子壽〉這篇臺灣最後的地主之家的傳奇，主人周海文守著一幢遠離人煙的深宅大院，平日深居簡出，種花讀書自娛，「他對人生的態度，只有財子壽三字」，因而他的最大志願是「靠不動產的收入」富上加富，是把充滿「祭器」和「朱色古物」的祖屋福壽堂維持現狀，但這個夢想卻在他的好色貪婪、妻妾爭權和兄弟傾軋中，七零八落，而高傲的、遠離變化的、像獨立王國的福壽堂，也只有徒具形式地與作為它的精神中心的「財子壽」，存在於鬼魅流連的「文明時代」的市鎮之外。相似的故事發生在〈合家平安〉，在那裡，衣食租稅，不事生產的敗家子范慶舍，被鴉片煙槍抽光了祖產以後，只有以僅存的封建的父親權威，無條件壓榨他的妻兒。在〈風水〉中善良的老人周長乾，因弟弟周長坤為保全對他有利的風水，任憑父親的墳墓敗壞下去，堅決不為父親洗骨，到了接二連三的不幸降臨他家，卻強自挖開埋葬不久的母親的墳墓，讓那沒完全爛掉的遺骸暴露天日，面對這大大違逆封建人倫的可怕景象，周長乾老人除了捶胸痛哭，並「不恨弟弟，只嘆人道的荒廢。」〈廟庭〉和〈月夜〉中，主角的舅父明知自己那死了丈夫再嫁的女兒，百般受婆婆、小姑和丈夫虐待，卻不肯答應離婚，原因只在「三百元的陪嫁錢和嫁粧都握在對方的手裡」，而且更重要的是給自己「留點面子」。〈清秋〉裡，那剛從日本學成回臺，計畫在故鄉開業的醫科畢業生，對鎮上那些成了「醫術之商賈」的醫生深惡痛絕，

對「醫學終究還是金錢的奴隸」這一事實感到悲哀，但他只把這歸結到開業醫生的墮落庸俗，不能信守做醫生是「一種『人』的責任。」

從〈牛車〉中對社會變遷的廣泛探討，到上述這些作品之集中於人性的剖析，呂赫若的創作方向上的轉變，有待新資料說明。在這些由人性的用度去看崩潰中的農業社會及其道德意識的作品中，值得注意的是經過五十年的日本殖民統治後，發生在臺灣知識份子中的新的意識觀念和價值取向的問題。這首先微弱地表現在〈風水〉裡把「洗骨」的風俗多少看成無謂的鬧劇的周長乾兒子身上，還有〈廟庭〉及〈月夜〉中，那位對家庭糾紛從根本上感覺茫然無力的主角，而後集中表現在〈清秋〉這篇小說裡。在這篇寫作於二次大戰前的短篇裡，醫科畢業生的主角耀勳，面對的是一個使他興奮而又無措的世界。一方面，在東京過慣都市生活的他，回鄉三月，發現自己仍然是個「田園之子」，對於前清秀才的祖父的漢學、浩然之氣，無限崇敬，更對祖父「以栽培菊花為樂趣」的這種「親近自然的風雅」，由衷「感到羨慕」。但是另一方面，看到扮演「時代先鋒」的弟弟，「毅然決然地跳入時代的奔流」，放棄在日本大阪的高職，志願到馬來亞去的行動，卻使他感覺若有所失。而在這中間最使他感到困擾的是，他馬上要「退居鄉間，成為一名開業醫生孝順父母」的事實，這意味著他終將與鄉鎮中已然成為「醫病之間賈」的醫生同列，這是他從心底嫌惡羞恥的，雖然他的決定開業「未必是為了要服務庄民而盡瘁」，但受過現代醫學教育的他，卻完全無法忍受「假藉金錢的媒介」消除人的疾病的行為，他的抱負是：「不要當一名鎮上俗不可耐的醫生，而應該當一名醫學者，更進一步去鑽研醫學，樹立人類永遠的幸福」。就這樣，這個自稱「淺薄的人道主義者」的醫科畢業生，在還沒有開業前就經驗了包法利醫生的那種屬於鄉村中產階級的精神貧困，他不斷感到「鄉村生

活的寂寞」，然而離開東京三月，居然發現自己對都市的「騷音」覺得陌生，這一切使他「心情無法安定」，使他發現「生活是矛盾的連續」，因而對即將遠行的弟弟，他終於坦然承認自己已經「體會不出生活的意義」，對生活「根本懷疑」。

呂赫若筆下的這個矛盾重重的問題人物，在十九世紀以後的文學作品中，並不陌生，他那輾轉在所謂「淺薄的人道主義」的朦朧的不安，更不難看出它的世紀末精神病痛的特質。然而這個擺盪在菊花的風雅與遠方的呼喚之間的未來醫生，這個充滿了善良意志的懷疑論者，除了帶有二十世紀資本主義社會清醒的知識份子的思想傾向外，應該有他特殊的社會根源，那便是經過五十年的殖民統治後，接受日本教育的臺灣知識份子，他們原有的傳統農業人民的善良性格，加上那來自資本主義的一切美好信念——如自由、平等、博愛、科學、民主、合理等等，在本質上是奴隸主與奴隸關係的殖民帝國主義的高壓下，表現出來的扭曲的、軟弱的性質。這情形正如十九世紀中，那些代表小布爾喬亞的和平願望的「真正社會主義者」，面對資本帝國主義的世界性掠奪，高舉「善良的人性」做為他們的戰鬥武器一樣。這個由複雜的社會歷史矛盾決定了的思想性格，這個因被殖民而來的精神意識的虛脫狀態，使成長於臺灣資本主義萌芽期的呂赫若小說，無法健全地走上那發生於資本主義時代的、充滿叛逆和批判精神的浪漫主義的道路，使他後期的創作只能從泛人性論出發，徘徊在那本來就是社會矛盾的產物的人性矛盾的探索之上，而這同時也使他的小說像牛車一樣，沉重地、辛苦地碾過那坎坷的被殖民的長路的最後一段，留下了深深的印記。

(1983)